

浙江

新诗史论

罗昌智 著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太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鲁迅《梦》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 戴望舒《雨巷》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让我合上了我的眼睛，

听，我摇起两支轻桨——

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的响；

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

别打我的船头掠过；

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

等我唱摇船的夜歌 陈梦家《摇船夜歌》

我那次关不住了，

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见了；

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右眼看，

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汪静之《月夜》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新诗史论

罗昌智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新诗史论 / 罗昌智著. — 杭州: 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81140-651-1

I. ①浙… II. ①罗… III. ①新诗—诗歌史—研究—
浙江省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2487 号

浙江新诗史论

罗昌智 著

组稿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赵 丹 余宇炜
责任校对	周敏燕
封面设计	王妤驰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651-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诗界革命”与白话诗:开启浙江新诗之门	18
第一节 “诗界革命”:浙江新诗的胚胎	18
第二节 白话新诗运动:浙江新诗的草创	28
第三节 鲁迅:为新诗的草创起先声	34
第四节 沈尹默、刘大白:弄潮白话新诗	48
第二章 “让我们做太阳”:浙江现实主义新诗的滥觞	62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诗美原则的确立	63
第二节 周作人:浙江新诗的拓荒者	68
第三节 俞平伯:“人生派”的“先锋诗人”	78
第四节 茅盾:为“写实”的诗评家	86
第三章 “专心致志做情诗”:湖畔诗人的“异军突起”	92
第一节 湖畔诗派:“歌笑”“歌哭”在“湖畔”的诗群	92
第二节 “专心致志做情诗”:建中国爱情新诗的塔底	97
第三节 突破与超越: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现代品格	106
第四章 “唯美”的“新月”:浙江浪漫主义新诗的崛起	117
第一节 建设“新格律”:浙江诗人的诗美追求	118
第二节 徐志摩:“创格”新诗与“抒写性灵的诗人”	127
第三节 陈梦家:后期新月诗派的“健将和代表人物”	141
第四节 孙大雨:“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	149
第五章 “纯诗”的狐步舞:浙江现代主义诗潮的涌动	156
第一节 “现代”的狂飙:浙江诗人与“纯诗”运动	156

第二节	戴望舒：“只为灾难树里程碑”的“雨巷诗人”	171
第三节	施蛰存：现代诗派的理论旗帜与拓荒诗人	190
第六章	历史的承诺：浙江现实主义新诗的繁盛	200
第一节	艺术与使命的统一：浙江现实主义新诗的归趋	200
第二节	执着于现实的呼唤：浙江现实主义诗人的立场	203
第三节	殷夫：“别一世界”的红色鼓动诗人	210
第四节	艾青：“迷人”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	221
第七章	走向“现代化”：浙江现代主义新诗的勃兴	235
第一节	“严肃的星辰们”：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235
第二节	穆旦：现代主义的先锋诗人	245
第三节	唐湜：“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	256
第四节	袁可嘉：构建“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267
第八章	“十七年”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浙江诗歌	279
第一节	“政治抒情诗”：“颂歌”范式的极致化	279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的博弈：浙江新诗的延宕与低徊	288
第三节	“潜在写作”：浙江新诗的“地下”状态	290
第九章	重振诗坛的“浙军”：新时期浙江新诗的复兴	295
第一节	“归来的歌”：浙江现实主义诗潮的回归与深化	296
第二节	“新诗潮”与“新生代”：浙江现代主义新诗的拓展	307
第三节	锐进的“先锋”：活跃的浙江青年诗人群	327
参考文献		342

绪 论

浙江乃“文化之邦”，自古人文荟萃，文风昌炽，有着厚重的文学积淀。而20世纪新文学的“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一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名家辈出，群星闪耀，推导潮流，引领文坛，蔚然而成的“浙江现象”引人注目。而就新诗而言，浙江诗人的“引领性”与“群体性”特征更是造就了浙江新诗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

浙江新诗，从“诗界革命”与白话诗，到现实主义新诗的滥觞，湖畔诗人的“异军突起”；再到“唯美”的“新月诗人”掀起浪漫主义新诗潮流，追求“纯诗”的“现代派”涌动现代主义诗潮；直至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走向繁盛，现代主义新诗蓬勃兴起；随后，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低迷延宕，终至新时期逐渐走向繁荣，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回首向来萧瑟处”，一路风雨一路歌。在百余年发生、发展的历程中，浙江新诗可谓高潮迭起，气象峥嵘。审视浙江新诗的流变规律，考察浙江新诗在中国新诗整体格局中的位置，提炼浙江新诗的文化品格，多层面与多侧面地展示浙江新诗的重大成就，既有历史的碑纪性意义，又有现实的范式性作用，更有未来的启示性效应。

一、浙江新诗发生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浙江有着悠久的文人诗歌传统。六朝时期，永嘉太守谢灵运，寄情山水，逸兴抒怀，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鼻祖。唐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浙江，获得了文学快速发展的机运，呈现出少有的中兴气象。“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与贺知章、寒山子、钱起、皎然、孟郊、方干、罗隐、贯休等皆有诗名，为唐诗的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宋期间，浙江诗人尤众。临安钱惟演为宋初“西昆体”代表人物，淡泊名利的林逋是隐逸派诗人代表，“永嘉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引领宋诗新潮。会稽山阴的陆游，则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当此之时，浙江词坛亦蔚为大观。婺州人张志和、乌程人张先、钱塘人周邦彦，皆为词坛大家。宋室南渡之后，浙江词坛更是空前活跃，凡有影响之词家大半出自浙江。避乱来浙，辗转杭州、金华、绍兴、四明等地的李清照为词坛名家，最后终老浙江。

与李清照同一时代的朱淑真，世居钱塘。两人均为我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被称作宋代女作家的双子星座。清代的“浙派诗词”在文学史上影响颇大。而浙词也在清代中兴，先后出现了“西泠十子”“柳洲词派”和“浙西词派”。

19世纪末，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浙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始终处于领先态势，从而使文学获得优先发展的机遇。被誉为“近代启蒙文学大师”的浙江杭州人龚自珍以思想先觉者的角色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序幕，同时也以超凡的诗人气质熏染了浙江文学的后继者们。20世纪初，被梁启超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的蒋智由、黄遵宪、夏曾佑首倡“诗界革命”，为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开启了一条新路，而浙江籍文人夏曾佑和蒋智由在其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此谓经世致用。两浙经世学风源远流长，极大地影响着浙江近代的文学创作。浙江的近代诗，最为突出的是涌现了一批爱国忧时、有所作为的作品。著名女诗人秋瑾写下了大量饱含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成为浙江文学史上的华彩篇章。与秋瑾友善的南社女诗人徐白华、徐蕴华姐妹，也创作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诗词作品。

时至20世纪，周作人、沈尹默、刘大白、“湖畔诗人”、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艾青、戴望舒、施蛰存、穆旦、唐湜、袁可嘉等等，一时多少诗杰，几乎占据了“中国新诗的半壁江山”。他们创立社团，领军流派，革新文体，建构理论，主导思潮，使整个中国新诗潮起潮涌。

中国新诗的草创，是以白话新诗的倡导为开端的。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鲁迅、刘大白、茅盾、陆志韦等浙江诗人，以新诗理论的先导性和在新诗创作上锐进的态势迅速成为出类拔萃的一群。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核心有两个：一是提倡白话，二是主张“诗体大解放”。白话新诗对于代表着旧的语言方式的旧诗的冲决，对于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场革命中，浙江白话诗人群先声夺人。1917年一二月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的口号。随即，鲁迅、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等对胡适鼎力声援。尤其是刘大白，他在《旧诗新话》《宋代白话文学的发展》等文中反复论证，诗不但应该是白话的，还应该是自由的。只有“贵族的文学”才是文言的，“出身卑贱”的人的文学自然就只有使用白话。正是鲁迅、刘大白们的鼎力声援，最终促成了“胡适体”的出现。“白话”的标志确定以后，新诗建立的进一步就是建立诗性规范。胡适就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体的大解放”。这是白话新诗的理论 and 创作纲领。早年致力于白话新诗倡导与创作的浙江诗人群，于此倾心非常。在诗论方面，俞平伯1919年3月出版了他的《白话诗三大条件》，以

“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周作人在对新诗创作作出考察后，积极认同与推崇“不必押韵的新体诗”，即自由体新诗，为新诗的体式变革奠定了基础。

在浙江新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现实主义新诗的倡导与试验有着奠基性的意义。这个时候，沈雁冰、俞平伯等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等诗论中都相当准确地认识到从《新青年》到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的诗歌创作“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①以此为发端，浙江新诗随后有一个长长的切入社会、面对人生的潮流的发展壮大过程。1922年1月俞平伯等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月刊），标志着从初期白话新诗衍化而来的写实主义的深化。而以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研会”浙江诗人一开始就表现了对人生严肃和冷静的态度，提出“为人生”的诗歌价值观念。诗人们在诗歌中所体现的“为人生”的写作态度，逼近社会现实，创作“血和泪”的文学倾向，在中国新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雁冰、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文研会”浙江诗人对现实主义新诗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但有了现实主义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实践上深化了现实主义新诗内容和拓展了现实主义新诗艺术，由此，浙江现实主义新诗进入到滥觞期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20世纪20年代初期，活跃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湖畔诗人”群是五四新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们的爱情诗，通过歌咏自由恋爱，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展示了以青春人格建立为标志的新道德，与中国传统的爱情诗相比较，有了情感内质上的飞跃，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新旧爱情诗的分野。

中国新诗在草创阶段基本完成了新旧转型，但五四白话新诗暴露出来的形式粗陋、诗歌“散文化”“诗不成为诗”等弊端；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新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的放纵与直露、形式“绝端的自由”等缺失也十分明显。这在新月诗人那里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要求，肩负起规范新诗、重建诗体的历史使命。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新格律诗运动的主将，同时也是这一派的“盟主”。他不但一直主持《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杂志，自始至终都是新格律诗运动这场被朱自清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主持者。他在新诗规范化与创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之成为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界碑。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②在新月诗人开辟的格律诗道路上，陈梦家“上承新格律诗派的余绪，

①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1937年1月第8卷第1号。

② 赵萝蕤：《忆梦家》，《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下开现代诗风的先河”，^①既传承了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早期诗人的主张，也适时匡正了新格律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一步扩展了中国新诗形式美的路径。陈梦家擅长吸收和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并将之有机融入新格律诗的创作中，有效提升了新诗的艺术审美品质，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向度延伸了中国新诗的诗美之路。邵洵美、孙大雨也都是成就突出的新月诗人。陈梦家曾在《新月诗选·序言》里极言邵洵美诗的浓艳之美，肯定其在新诗艺术上作出的成功探索。在新月诗派热心创制新格律诗时，孙大雨在运用外国诗的韵律上有独到之处。他采用“商籁体”创作的诗歌，格律严谨，操纵裕如，为中国新诗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

浙江新诗，在20世纪30年代渐入成熟，其重要推动力量当是现代主义诗潮的涌动。戴望舒、施蛰存、徐迟、钱君匋、孙大雨、赵萝蕤等，都是现代诗派的领军人物。尤其是戴望舒，在百余年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其第一次较为成功地对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进行了高度整合。同时，戴望舒的创作又表现出对五四时期以及20世纪20年代各种新诗现代化艺术探索的综合与超越。他从五四白话诗歌中汲取了注重意象的方法，采用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讲究意象的多种暗示性的手段，将写实性或单纯的比喻性意象发展为寄兴式、隐喻式的象征性意象；他对浪漫主义坦白奔放的抒情形式极为反感，但是提倡诗歌的“诗情节奏”或“内在韵律”的主张却与郭沫若又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不满新格律诗派的“三美”原则，却注重采纳传统诗歌的优长，在中西诗艺的沟通中形成的和谐典雅的颇具现代古典主义的诗风与新格律诗派又如出一辙；他不满象征派诗人的神秘晦涩，但在诗歌的审美价值观念、意象艺术诸多形式方面却表现出同宗象征主义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广采博纳，多方融合，才使戴望舒有了现代主义诗艺的新突破。

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中，穆旦也是丰富多彩的浙江诗坛上具有先锋意味且有一定实绩的诗人。他的诗歌，根植于苦难多灾的现代中国，诗艺上融贯中西，颇多创新，不仅具有成熟现代诗的先锋气质和诗质底蕴，而且大多具有思索社会和自省心灵的双重深度。20世纪40年代，李瑛曾说：“穆旦完全是以一个新姿态从事诗坛的开垦，他的诗歌装下了哲理新意识的内容，不能不说是崭新的尝试。”^②作为诗人，穆旦“比中国任何新诗人更为现代化”。^③穆旦的诗是最现代的，也是最“西化”的，但发人深省的还在于：这种现代化、西化同时又表现为十分鲜明的现实性、中国性。不管穆旦多么倾慕

① 吴家荣：《论陈梦家诗歌理论的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 李瑛：《读〈穆旦诗集〉》，《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9月27日。

③ 转引自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现代主义思潮，但他总是立足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去诚恳地感知现实，但现状的恶浊又令他产生深刻的疏离感。而这正是穆旦的精神。他投身时代，始终被现实牵制着，却绝不被同化，而是同现实作着持续的、疲倦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获得了现代性的价值。

浙江现代主义诗潮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承续者便是九叶诗派中的穆旦、唐湜、袁可嘉等人。作为现代诗派中炫人眼目的诗人，穆旦、唐湜、袁可嘉们敏锐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带来了新诗观念的更新，开辟了一条以诗的方向把握客观现实，传达情感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同时，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代表着浙江现代主义新诗的勃兴。

五四白话新诗时期以及“人生派”的浙江诗人对现实主义新诗的倡导与试验，奠定了浙江现实主义新诗的第一块基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浙江诗人在现实主义诗歌的道路上一路迈进，执着于现实的呼唤，实现着艺术与使命的统一，履行了现实主义诗歌对历史的忠实承诺，创造了浙江现实主义新诗的繁盛时代。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与论争掀起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也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潮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翼的“普罗诗派”也随之形成了。以殷夫等为代表的普罗诗人贴近时代风云，贴近社会现实，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强烈战斗精神。他们的创作具有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特质，促成了“革命诗歌”的高涨。在抗战以后，浙江新诗和整个中国新诗一样，急速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成长与繁荣起来。这时，诗人们更有意识地用他们的创作热情，与中国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的创作大都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现实主义创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显出生机和活力，现实主义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诗歌创作中居于压倒一切的主流地位。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次的现实主义诗潮中，浙江新诗人都堪称中坚。因“红色鼓动诗”享誉诗坛的殷夫可视为 20 世纪 30 年代“普罗诗歌”的领潮诗人，而延安诗派、七月诗派时期的冯雪峰、艾青、阿垅、冀沅、力扬、赵萝蕤、赵瑞蕤以及温州“海燕诗社”诸诗人……都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大量现实主义力作。艾青更是 20 世纪 40 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颇有建树，而且以《诗论》《诗人论》《诗与时代》等论著系统地构建起新诗的美学体系。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艾青第一个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现实主义诗学观，并在创作实践中使自己的美学理论得以成熟和完善，以至成为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共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浙江新诗与全国整体格局

一样，必须对当代风云和政治运动予以呼应和阐释，表现与歌颂新的生活、新的世界。于是，被称为“政治抒情诗”的“颂歌”范式产生了。在这股“颂歌”主潮中，政治敏锐性极强的浙江诗人，以发自内心的真诚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就题材而言，有反映新旧社会变化的诗章，如艾青的《我想念我的祖国》《双尖山》，唐湜的《划手周鹿之歌》和蔡根林的《东阳江》，谢其规的《秋天的杜鹃花》；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生机的新作，如福庚的《新安在天上》，倪善华的《水乡秋歌》，田地的《佛子岭组诗》，郑成义的《喜报》《鼓点集》；有反映边疆海岛生活的诗歌，如陈山的《擂鼓集》，以及方牧的作品，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乃至全国诗坛引起一定反响。就题材而言，有民歌体新诗，如李苏卿的《小篷船》《月下挖河泥》等；有叙事体长诗，如艾青的《黑鳗》《藏枪记》，徐迟的三部同名长诗《望夫云》，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共同汇成了一股强劲的诗潮，为浙江当代新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局。

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对作家高压态势的形成以及对文学话语权的严密控制，浙江新诗更是日渐式微。而“式微”的开始，应自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使艾青、冀汭、阿垅等“七月诗人”的艺术生命严重受挫始。接着，九叶诗派也从诗界消失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艾青、冀汭、阿垅、唐湜、袁可嘉、穆旦、陈梦家、孙大雨、邵燕祥、岑琦、田地等诗人遭遇厄运，相继被打成右派，也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浙江诗歌界又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从诗歌创作的艺术层面上看，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很少有浙江诗人能创作出表达自身真情实感的作品。题材狭隘、缺乏性情和个性、大而空、以简单的“呐喊”代替艺术的深入探索，所剩下的只是群众性的、大众化的“颂歌”和“战歌”，等等，这成了浙江新诗的通病。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浙江诗界总的趋势是诗歌“政治化”的步伐加速。因而，在创作上充斥着“假、大、空”的口号、颂歌型作品。而在“文革”时期，浙江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相继停刊，诗歌的发表和诗集的出版也告中断。浙江诗歌沉陷于一个“无诗的时代”。

尽管浙江新诗在“十七年”后期与“文革”中，走进了延宕与低徊时期，但拨乱反正后，新时期的浙江诗坛，又重现生机。

新时期浙江新诗的复兴，首先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复归。在欢呼“第二次解放”的日子里，浙江诗人们以诗为喷射激情的枪口，将长期压抑过后狂喜的情感一泄为快，呈现出以“欢乐颂歌”为主流的诗歌热潮。在艾青的带领下，浙江形成了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流的诗人群落，一批重获“解放”的中老年诗人在1979年到1980年之际，唱出一支又一支悲怆动人的“归来的歌”。而“归

来的歌”这股因艾青复出后第一本诗集而命名的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其“归来”又不仅仅是指诗人的归来，更多的是归来之后对于历史的深入反思。众多的或以“归来”命题或并不以“归来”命题的诗作，其基本特点在于普遍表达了一种经历了非常磨难之后抚今追昔、痛定思痛的情感经历。田地的《复活的翅膀》、冀汭的《我赞美》、陈继光的《泪水孕育的歌》、谢鲁渤的《雪地里的冬青》等，这样一些“归来的歌”，就通过沉痛的忏悔和反思，解剖了一个时代和整整一代人。贯穿在作品中的批判精神和理性态度使诗歌的思想蕴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其中透出的执着、坚韧相结合所形成的慷慨悲凉的美学风格，极大丰富了现实主义诗歌的美学品格，标志着浙江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精神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恢复和发扬。同时，孙武军、吴晓、张德强、黄亚洲、楼奕林、柯平、王彪、嵇亦工等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浙江中年诗人，也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新时期诗歌创作，在走向成熟的同时又有新的探索与发展。他们在“新诗潮”中倾心于从传统现实主义诗歌以外汲取艺术营养，突出表现为对意象、象征、通感、变形等西方现代派诗歌技巧的借鉴和运用，这使现实主义诗艺在与现代主义艺术方法的融汇中得到发展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诗歌的深化与超越。

新时期浙江新诗的强劲势头，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再次繁荣。浙江此期的现代主义诗潮，首先是以大胆的民间诗歌群体形象展示在诗坛上。“我们”诗社、“地平线实验小组”、“远方”诗社、“原野”诗社、“十二路”诗社、“北回归线”诗社、“野外”诗社、“九龙”诗社，以及南方生活流、东海诗群，等等，活跃在浙江诗坛的诗歌群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这些群体与刊物周围，集结了大批的诗人。多年来，浙江诗界涌现了以沈泽宜、黄亚洲、伊甸、南野、梁晓明、梁健、蔡天新、刘翔、潘维、荣荣、伤水、晏榕、沈方、池凌云、沈娟蕾、泉子、远村、柯健君、章锦水、陈剑冰、胡嘉平、舒航、伊有喜、丁胜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优秀现代主义诗人。其次，新时期浙江现代主义诗潮以锐进的态势，进行着执着艺术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诗坛的几个重要诗歌群体——南方生活流诗群、东海诗群和北回归线诗群，尽管在把握真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与反映现实世界的表现策略上，与新诗潮、后新诗潮相互呼应，与整个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进程保持一致，但他们敢于绕过全国文化寻根诗潮而探求自身之路。南方生活流诗群追求凡人生存状态的抒情，具有形象的现实庸常性与意蕴的生存象征性相结合的审美特性。东海诗群追求海域风光的抒情，具有形象的浪漫神异性与意蕴的生命强力性相结合的审美特性。北回归线诗群追求生命经验的抒情，具有形象的生命变形性与意蕴的智慧寓言性相结合的审美特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诗群所掀起的三股创作潮流在齐头并进中有了较大跨度的递进。生活流诗群以其庸常人生中寻求人性

至美的特性影响了新写实诗的出现。东海诗群以其对原生力追求的神异奇幻特性，影响了新浪漫诗的出现。北回归线诗群以其对社会生态作夸张变形的追求影响了超现实主义诗的出现。而新写实、新浪漫、超现实三股新潮，以其极具现代色彩的诗美风尚，使浙江诗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又一次从全国格局中游离出来，避开“民间”“学院”之争，着眼于创作原则，致力于严肃探求，因而在世纪之交推出了一批在全国格局中颇显实力的诗人。^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浙江诗歌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与全国诗歌同步，也明显出现了嬗变与转型。“转型”的推动，使整个浙江诗坛呈现出多元态势。“新乡土诗”“先锋诗”“新理想主义”“生命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等都相继出现。远村、伊有喜、吕焯、飞沙的荒诞主义，杨邪、小荒的口语写作，江一郎、东方浩、泉子等的独立写作，谢君、苏梦人、李英昌、南蛮玉的隐逸抒情，等等，构成了浙江诗歌的多声部交响。

二、中国新诗整体格局中的浙江新诗

回望整个 20 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浙江新诗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引领性”地位尤为显著。

首先，浙江诗人在 20 世纪的历次诗歌运动中，总能主导诗潮，领衔流派，积极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新诗，孕育于“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中的核心人物浙江学人夏曾佑以及文坛泰斗章太炎、启蒙诗人蒋智由、秋瑾等人，面对如云翻卷的时代骇浪，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革新诗潮。夏曾佑们不为古人所拘囿，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这种追求“新理想”“新意境”的文学主张，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诗界革命”关注时事，注重新学，为五四新诗最终摆脱两千多年封建道统的束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诗界革命”力举“心口合一”“以文为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蜕变提供了借鉴。

中国新诗，草创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茅盾曾说：“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的，除了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②在茅盾所列出的“开路先锋”里，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都是浙江诗人，当然，这个时期的浙江作家鲁迅、刘大白，也包括茅盾自己，也都是新诗运动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以新诗理论的先导性和在新诗创作上锐进的态势迅速成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出类拔萃的群体。在中国诗歌脱胎换骨、

① 参见骆寒超《浙江诗典·序》、《浙江诗典》，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②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1937 年 1 月 1 日第 8 卷 1 号。

蜕变求新的转型时期，正是这一群浙江诗人真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大门。

“异军突起”的“湖畔诗人”则把爱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们专心致志吟唱爱情的诗篇中，由真挚的情感，活泼的形式，灵动的技巧，单纯、清新、淳朴的诗美所构成的独特审美风格，标志着爱情的抒写模式实现了现代性转换，标志着爱情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在古老的诗国——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凝练之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情诗的文体意义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彻底打破了旧诗的禁锢，完成了新诗的草创。但旧诗的秩序被打破以后，新诗面临的却是一种近于“无序的状态”“无治的状态”。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诗人”开始了对白话诗与浪漫派诗的反拨，开始了新诗范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他们把“本质的醇正”“情感的节制”“格律的谨严”当做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三者的紧密联系和统一，构成了新月诗人们关于诗歌艺术规范化运动的实质内容，明显带有诗歌艺术的唯美倾向，追求新诗的形式美，使新诗朝着诗应有的方向进一步迈进。而在这个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群体中，一群浙江诗人——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方令孺等功不可没。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诗派”，将现代主义诗歌带进了中国。在这股现代主义诗潮涌动过程中，浙江诗人群贡献首屈一指：标志现代诗派形成的《现代》杂志，第一主编便是施蛰存；创刊于现代主义诗潮全盛期的《新诗》与《菜花》，主编则是戴望舒与徐迟。在现代派诗人群中，戴望舒是“诗坛的首领”，施蛰存是重要的理论家，徐迟是难得的诗坛新锐。此外，还有钱君匋、孙大雨、赵萝蕤等，都是现代派诗人群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浙江诗人以其群体性构成了一道现代主义诗歌的长城。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主义诗潮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作为其承续者的便是具有明显现代主义特征的九叶诗派。九叶诗派的崛起，是中国新诗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的又一波“现代化”高潮，标志着中国新诗的中兴。而浙江诗人穆旦、唐湜、袁可嘉无疑是九叶诗派中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新诗史上，他们以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先锋品格共同为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新诗诞生以降，现实主义诗潮一直占据着中国诗坛的主导地位。而浙江诗人群在新诗的创作上，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亦颇为鲜明。以俞平伯、沈雁冰以及周作人等为代表的浙江诗人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但有了现实主义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实践上深化了现实主义新诗内容，拓展了现实主义新诗艺术，由此奠定了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基石。因“红色鼓动诗”享誉诗坛的殷夫可视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领潮诗人。而艾青则被人们看成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他

一登上诗坛，便很快显示出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的雄厚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艾青的诗歌创作，划出了现实主义新诗运动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而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前行的方向在浙江诗坛都可找到源头，充分显示出浙江诗人的艺术追求既有普遍性又有前瞻性。从现实主义诗潮的复归与深化，到现代主义诗潮的涌动与崛起，浙江诗人都堪称“先锋”。更应关注的是，在与全国诗坛接轨并行的同时，浙江诗人并没有被大一统的潮流所左右，而是有所创新地游离于全国格局，有了属于自己的流向。

其次，浙江诗人在领衔中国新诗运动的过程中，与更新传统诗歌的文体意义相适应，在理论上也发乎先声，拓新了中国传统诗学，建构起完备的体系，成为中国新诗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诗美学规范的创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叶，夏曾佑、章太炎等早期启蒙诗人首倡新诗创作要运陈入新、融化中西、以新名词入诗，从理论上催生了新诗。五四时期，刘大白、俞平伯为代表的白话诗派极力声援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用白话刷新了诗歌的语言工具，促成了新诗的草创。1908年鲁迅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极力推崇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摩罗诗人”，鼓吹诗人的战斗性，目的正在于“别求新声于异邦”，呼唤中国诗歌中出现“精神界战士”。而周作人早在五四白话新诗萌芽之初，就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对于诗歌理论与创作的见解，第一个提出了中西诗学互相“融合”的理论及其实现途径，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徐志摩、陈梦家们又总以敏锐的诗眼检视着新诗的流向。当新格律诗的理论发展到后来，格律美的追求出现了矫枉过正现象的时候，徐志摩就宣称“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①并自觉地认识到格律理论自身的缺憾所在。陈梦家针对这一现状，及时地修正了诗歌格律化的理论。同样，当孙大雨察觉到因过分强调格律而导致新诗在创作上出现了“豆腐干”诗和“骨牌阵”的时候，立即在《诗歌的格律》里对闻一多“建筑美”理论有了补充和修正。“现代诗派”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诗派，由浙江诗人徐志摩、邵洵美、戴望舒、施蛰存、艾青等先后发起与领衔，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掀起了一股“纯诗”运动的狂飙。他们自觉地寻找中外诗歌的融合点，并力求在融合中表现出积极的创造精神。尤其是在诗歌的审美趋向上，现代派诗人提倡一种“新的智慧诗”。这种“新智慧诗”，就作者而言，要“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之智慧的凝聚”；就诗歌本身而言，它是“情智合一”的结

① 徐志摩 《诗刊放假》，《晨报副镌·诗镌》1926年6月10日第11号。

晶体；就读者而言，这种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此外，戴望舒们对于现代白话口语的诗歌语言的提炼，对于散文化自由诗体的创造，都为后来的新诗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一定的借鉴作用。秉承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将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极致。九叶诗派诗学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现代化，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注重在诗歌中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承接着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而以穆旦、唐湜、袁可嘉为代表的浙江诗人，当是这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中最彻底的诗性自觉者。他们敏锐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带来了新诗观念的更新，开辟了一条以诗的方向把握客观现实，传达情感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们以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先锋品格推导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艾青是一位标志性人物。1941年，艾青出版了语录体的诗学专著《诗论》。在《诗论》里，艾青指出：“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原野上驰骋的。这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就是真、善、美。”在艾青看来，每一个诗的分子都是由真善美三种成分构成，诗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①由此，艾青建构起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诗学体系。

再次，在百余年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诗人致力于经典锻造，以无数艺盖群芳的诗作标志着他们在新诗坛上的“盟主”地位。尤其是在新诗现代体式的创建、现代诗艺的探索上，他们更是独领风骚，领袖群伦。

浙江新诗人大都属于文体诗人。五四新诗运动时期，被朱自清先生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之一的沈尹默在诗歌形式上就作了多方面的大胆探索。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散文诗的作者之一，其代表作《三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分段不分行的新诗”。而在散文诗的“体裁创新”上，鲁迅更是以他的《野草》为代表，奠定了五四新文学中第一块散文诗的基石。周作人率先提出新诗的体式应该是抒写真情实感的“自由体”。在创作中，他将语体散文运用于诗歌写作，实现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解放。他不但用散文写诗，而且写的是散文化的诗，打破了传统诗歌韵律的限制，创作出真正的自由诗。《小河》就是一首完全摆脱了旧诗格律的自由体新诗，在新诗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康白情认为，《小河》标志着“新诗乃正式成立”。刘大白的新诗，则在艺术上继承了民歌的优秀传统，朴素明快，平易感人。特别是引民间歌谣的诗体经验入诗，大胆进行民歌体新诗创作的实践，具

^① 艾青：《诗论》，《艾青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当是刘大白对中国新诗的一大贡献。

在“新月”浙江诗人群中，徐志摩、陈梦家们创造新诗格的成就，更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旅程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朱自清曾说，徐志摩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①中国新诗在徐志摩这里，开始了一个“创格”的时代。他与闻一多等人一道开始了建设新诗格律的试验，并建立起自己的“创格”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徐志摩首先把“创格”看做是新诗艺术表现的需要，主张把诗的“完美的形体”看做是诗人的“完美的精神”的“唯一的表现”。^②也正如朱自清所说，徐志摩对新格律诗的贡献不在理论的“领导”而在“创格”的实践，徐志摩在诗的“体制的输入与试验”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实绩，深得时人称道。穆木天也说，徐志摩“作了各种的尝试”，“他的全部诗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诗歌之发展过程”。^③他所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创格”试验，丰富了新诗的艺术宝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月诗人群里，孙大雨很大程度上别属一路。在“商籁体”的移植与创作上，他是最早的探索者。他的《爱》是中国最早的一首格律严谨的十四行体诗。到新月派《诗刊》时期，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日臻成熟。陈梦家论及孙大雨时说：“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增加了成功的指望。”^④

现代派诗人登上诗坛的时候，他们追求“纯诗”的艺术目标首先定位在“现代诗形”的构建上。这其中，施蛰存、戴望舒、穆旦等浙江诗人以“纯诗”为本，反对五四自由诗的“非诗化”倾向和新月派的极端形式主义倾向，主张以自由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舒卷自如的生活化口语，表达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在五四自由诗的“自由化”与新月诗派的“规范化”之间找到了广阔自由的形式天地，建立起独到的“现代诗形”。这种“现代诗形”，与五四自由体诗之不同，在于它“在诗体上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有半透明的意境而又有半音乐性”，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节奏，和按照体型而加剪裁的自由体”；^⑤与注重形式严谨的新月派的格律体诗的不同，在于它强调诗的艺术性，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追求形式的有意味性。戴望舒们在力矫五四自由体诗之弊，多取新格律体诗之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由、精致而又新奇的新诗形式。

九叶诗派的重要人物唐湜，在新诗艺术的探索上亦成就非凡。他是九叶诗派中创作十四行诗最多、写作评论文章最有影响、撰写长篇叙事诗最丰富的一

①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② 邵华强《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168页。

③ 同上，第323—324、342页、291页。

④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

⑤ 杜衡（苏汶）《望舒草·序》，《现代》1933年8月第3卷第4期。